

青年星雲與戰後台灣佛教 ——以《星雲日記》所述第二屆中佛會 全代會為例

陳知浩

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

摘要

戰後台灣佛教，隨著大陸緇素來台，進入一個新的變局。中國佛教會（以下簡稱中佛會）於1950年在台復會，在戒嚴時期壟斷管理佛教的權力，成為台灣佛教的最高組織。1952年首度改選，舉行第二屆全代會，以解決組織的法理問題，並進行權力重組。年輕的星雲大師（下稱青年星雲）參與了此次二屆中佛會全代會，於會議結束後，在其日記裡記錄了參與歷程，是與會者的一手資料。透過他敏銳的筆觸，可知當年修法角力之情況與核心權力轉移之變動。青年星雲於關鍵時刻，挺身化解背離僧事僧決的修法危機，有至為出色的表現。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的結果，象徵中佛會來台復會後，組織初步盤整有成，為日後發揮主導台灣佛教全局奠下立穩腳跟的基石，《星雲日記》為此一盛會留下重要的歷史見證。

關鍵字：青年星雲 中國佛教會 戰後台灣佛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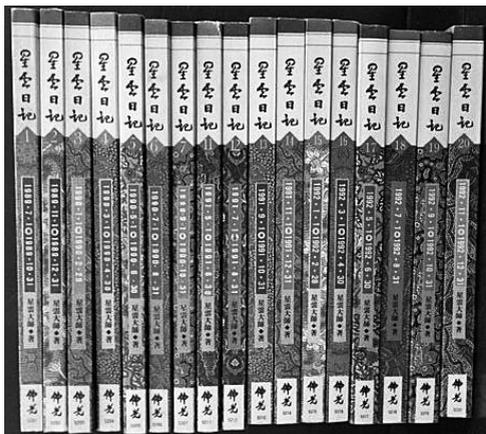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前言

戰後台灣社會百廢待興，在國民政府接收後，台灣佛教界進入了不同於此前日本殖民時期的發展，隨著中國佛教會於 1950 年在台北復會，¹ 迎來新變局。在戒嚴體制下，中佛會是唯一的中央佛教組織，只要是出家僧人一定要加入該會，此組織由大陸來台的僧侶執掌，逐步成為主導台灣佛教發展的力量。

中佛會來台復會初期發展曾面臨困境，除組織渙散且經費拮据外，² 更面臨著法理危機，因為依《中國佛教會章程》第二十八條規定，中佛會須每三年舉辦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³ 但 1950 年第一屆的任期已屆滿，卻未如期改選。直到 1952 年終於迎來改選，舉行關鍵的第二屆全代會，以解決組織法理問題，並進行權力轉移，為穩固後續在台發展起了重大作用。

星雲大師（1927-2023）於來台初期，曾寫了 20 餘本日記，後因一時感慨，將之焚毀，幸而 1952 年 7 至 9 月的日記手稿殘存下來，其中 9 月 2 日這天的日記裡，有著他參與第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的詳

1. 中國佛教會最早成立於 1929 年，第一屆中佛會全代會於 1947 年在南京召開，因國共內戰的影響，中佛會部分核心幹部成員隨國民政府轉移至台灣，因之復會。參見釋堅如主修，顏尚文總編纂：《臺灣佛教通史·第四卷·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運作》，台北：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，2022 年，頁 54、61。
2. 南亭法師直言中佛會一貧如洗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組織人員與文物兩缺，連最重要的「會印」都沒有從大陸攜出，幸得東初法師攜有蓋中佛會大印的公文，在章嘉理事長的同意下，複刻一枚，另以白聖法師充為常務理事，讓常務理事會人數過半，南亭法師則寫了中國佛教會的招牌張掛。參見南亭和尚編纂委員會編纂：《南亭和尚全集》第 12 冊，台北：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董事會，1994 年，頁 165-166、169。
3. 《中國佛教會章程》1947 年第一屆原始版，參見同註 1，頁 449。



星雲大師著作《星雲日記》

細記錄，⁴可說是與會者的第一手觀察資料，為此一盛會留下重要的歷史見證。他之後並據此修改，撰寫了〈我為什麼要辭「中佛會」常務理事？〉一文，刊登於1952年10月10日出刊的《人生雜誌》第4卷第10期。⁵

筆者嘗試透過青年星雲敏銳的視角，從其日記了解這場

發生在70幾年前，台灣佛教最高組織的會議過程，析論他對該會的觀察及會議上的表現，希望增加對二屆中佛會全代會、青年星雲及戰後初期台灣佛教的了解，填補一些過去較被忽略及不清楚的空白。

二、青年星雲在第二屆中佛會前的經歷

青年星雲在1952年參加二屆中佛會第一次全代會時相當年輕，只有26歲，我們可以將他此前的閱歷分成幾個階段來看，有助於了解他在二屆中佛會時的觀察與臨場表現：

1、早年出家叢林時期：1927年生於江蘇江都縣，6歲入私塾，因家境貧困學習常中斷，8歲於寒冬時不慎跌入冰河昏迷獲救，11歲時日軍攻占南京逃難至興化縣，家裡受戰火波及被焚毀，12歲禮

4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254·星雲日記1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7年，頁42、77-87。

5. 星雲大師：〈我為什麼要辭「中佛會」常務理事？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200·星雲智慧2》，頁93-102。

棲霞山寺志開法師剃度，13歲進入棲霞律學院，在寺裡擔任既苦又累的行堂工作數年，16歲因協助管理棲霞律學院圖書，得以大量閱讀中西文學，接觸到現代新思潮。⁶

2、佛學院學習時期：18歲投考天寧佛學院未成，自請留在常州天寧寺任行堂苦行職事一年，19歲轉入有「佛教界北大」之稱的鎮江焦山佛學院就學，領行堂苦行工作，並開始創作小詩與散文投稿於鎮江各報副刊，出色的文筆讓他應聘為《新江蘇報》副刊編輯，20歲參加太虛大師主辦的「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」，又從太虛大師創辦的《覺群週報》中初步認識為什麼佛教要革新。⁷

3、白塔國小與華藏寺獨當一面期：21歲出任宜興白塔國小校長，上任後整頓學校，與智勇法師共創《怒濤月刊》，宣揚興教救國，號召改革佛教，期間被地方政府誤認通敵入獄歷險10天，脫險後於22歲離開宜興轉赴南京，得蔭雲和尚委任，與智勇法師共治華藏寺，在寺中推動改革，又受聘主編《徐報》的「霞光」副刊宣揚佛法，23歲在華藏寺推動「新佛教運動」失敗。⁸

4、來台迄法雲寺時期：1949年春時局緊張，交卸華藏寺住持後，帶領「僧侶救護隊」來到台灣，幾經掛單沒有著落，經妙果和尚收留得以暫棲中壢圓光寺，承擔寺中勞動苦役，因被誣陷為匪諜，被捕入獄23天獲保釋，之後到台中主編復刊的《覺群週報》，是年冬至苗栗法雲寺短期看守山林，暇餘撰稿投刊《菩提樹雜誌》

6. 參見釋滿義編著：《星雲大師年譜1》，收入《星雲大師全集227》，頁57-92。

7. 參見《星雲大師年譜1》，頁93-99。另參見陸震廷：〈星雲大師年表〉，收入陸震廷、劉枋等主編：《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》，台北：采風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324-325。

8. 參見同註6，頁100-109-124。

及《覺生月刊》，後來結集出版，書名《無聲息的歌唱》。24歲為中廣撰寫廣播文稿，又投稿《菩提樹》、《覺生月刊》、《戡戰日報》、《自由青年》、《人生月刊》等雜誌，被譽為佛教界文藝之星，甚至有教外刊物與社會報紙欲高薪聘為編輯與記者。⁹ 25歲在報刊呼籲佛教制度應該改革。¹⁰

5、新竹青草湖時期：1951年11月，應大醒法師之邀，至新竹青草湖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，又因東初法師邀請主編《人生月刊》，參與在台北的監獄弘法團，與李子寬、陳慧復、南亭和



青年星雲（前排左三）曾任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教務，圖為甘珠活佛（前排左五）與慈航法師（前排右五）蒞臨新竹靈隱寺，與講習會師生合影。（靈隱寺提供）

9. 參見釋滿義編著：《星雲大師年譜1》，收入《星雲大師全集227》，頁109-131。

10. 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與佛教青年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200·星雲智慧2》，頁19。此文原載於《人生雜誌》第3卷第6期，1951年7月，頁11；另參見釋滿義編著：《星雲大師年譜1》，收入《星雲大師全集227》，頁110-123。

尚、廣慈法師等輪流至監獄宣講。26歲應新竹市佛教支會邀請，與演培法師等人於週六晚間，至市區關帝廟布教演講。¹¹

從上述可知，青年星雲在參加二屆中佛會前的人生歷經艱難憂患，筆者覺得其經歷有幾點值得注意：

其一，對文藝創作的高度熱情與才華：從19歲開始投稿，迄26歲之間，青年星雲的作品散見江蘇大報，如《新江蘇報》等，來台之後，常見於《菩提樹雜誌》、《覺生月刊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戡戰日報》、《自由青年》、《人生月刊》等。青年星雲對文藝寫作有熱情，有出色的文筆，長期創作不懈，作品持續獲得刊載，知名度大增。¹²

其二，屢次擔任編輯工作：青年星雲曾任《新江蘇報》副刊編輯，創辦《怒濤月刊》，主編過《覺群周報》與《人生月刊》。一般勝任編輯工作者，需有不錯的文筆與組織能力，對細節處理敏銳，審慎於文稿修潤校對，責任心強，善於協調溝通，方能在人力與經費匱乏的情況下，讓刊物順利在期限內完成。青年星雲的文筆、撰稿與編務能力皆為僧中翹楚。

其三，懷抱興教救世理想與教育工作：青年僧侶不乏雄心萬丈者，著者如圓瑛法師。¹³ 同樣懷抱壯志的青年星雲，在21歲時不畏

11. 參見釋滿義編著：《星雲大師年譜1》，收入《星雲大師全集227》，頁124-131。

12. 東初法師認為青年星雲在《人生雜誌》發表文章，打開了知名度。見《星雲大師全集217·百年佛緣7》，頁191。闕正宗認為勤於筆耕，保持媒體曝光度，使青年星雲累積知名度，日後快速崛起，參見氏著：《重讀臺灣佛教——戰後臺灣佛教（續編）》，台北縣：大千出版社，2004年，頁288。

13. 圓瑛法師在親撰盟書中，期許與太虛大師同為佛國棟樑，不可虛度光陰，甘居人下。參見釋印順編：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1973年，頁28-30。

艱難，至辦學環境惡劣、處於戰火地帶的宜興白塔國小擔任校長，兼任行政與教師，投身教育工作，¹⁴ 後來在台灣，25 歲時受邀至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，從事教學及教務工作，投身僧伽教育。其有僧俗兩界的辦學經驗，了解教育培養人才的重要性。

其四，受太虛大師影響，並有管理寺務的經驗：青年星雲受太虛大師佛教革新的影響，富有熱血的改革理念，在接手住持南京華藏寺後，推行「新佛教運動」，期以革新寺務，雖在陋習已深的住眾反彈下失敗，但擁有主持與實際管理寺院的經驗，較了解寺院與團體組織的理念與運作，有助相關議題發言時的說服力。

其五，對政軍力量與白色恐怖的深切體驗：青年星雲在白塔國小校長任內遭拘捕 10 天，於押赴刑場時受救脫難，歷千鈞一髮之危；1949 年來台，在戒嚴後的 6 月，全台大肅檢陸僧匪諜案時被捕，¹⁵ 在獄中度過驚險的 23 天，見證政治大環境下，白色恐怖肅殺力量的險惡。

其六，接地氣的弘法工作：青年星雲在監獄中宣講弘法，或在市區的街頭布教演講，都是直接面對廣大的群眾，可訓練上台不怯場，其理路清晰且侃侃而談，以最吸引聽眾注意的方式陳述。

綜上可知，星雲大師年少時歷經顛沛流離，在大叢林受傳統僧伽養成，在佛學院學習時嶄露文藝長才，且胸懷經世壯志，二十初頭即能獨當一面，擔任小學校長負責營運，又實際主持管理改革華藏寺，而從大陸輾轉來台，親歷白色恐怖下的牢獄之災，其後文學

14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90·往事百語 3》，頁 115-116。

15. 《星雲大師年譜 1》未記明「教難」月份；經查，可能是 1949 年 6 月。參見釋永芸總編輯，高淑玲主編，陳卓君、宋芳綺編輯：《世紀的悲欣歲月——走過臺灣佛教五十年寫真》，台北：佛光文化，1996 年，頁 68。

與編務之能，連教外刊物都深為肯定，而監獄與街頭布教的歷練，使其於大場面不怯，具有在大眾前能夠快速組織思緒，清晰條理陳述表達見解的能力。

三、青年星雲對第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的觀察與作為

青年星雲在 1952 年 9 月 2 日這天的日記中，詳細回憶記錄其參與第二屆中佛會一次全代會的觀察，筆者以為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：

（一）第二屆中佛會全代會召開異常倉促與冷清

青年星雲曾列席在南京召開的第一屆中佛會全代會，比較第二屆中佛會的召開，後者在聲勢上與革新佛教內容的表現遠不如前者，且籌辦之倉促與冷清無聞，更是令人唏噓不已，他在日記中的記載如下：

我參加第二屆中國佛教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，於八月三十日下午閉幕了。這是一件在佛教中一件如天大的事情，開會前是冷冷清清，開會後是不聲不息……腦海裡老在回憶著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在南京召開的第一屆大會的情形，那時候，競選代表的熱烈，大會討論改革佛教的高潮，報章雜誌爭載大會的消息，那些佛教蓬勃新生的情形，猶在目前。然而時代、國家、佛教，都已今非昔比了……是在八月十一、十二日吧，我收到中佛會寄給我選舉代表的名單，我方才知佛教掀起這麼一件大事了……又過了大概十多天吧，我又接到中佛會一張開會的通知單。¹⁶

16. 引自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54·星雲日記 1》，頁 77-78、87。

青年星雲在 1952 年 8 月中旬接到選票，才知道重大的二屆中佛會即將召開，此時距 8 月 29 日全代會預備會召開的時間，只剩兩個多星期，而中佛會台北的選務工作中心得等各地選票寄回，確認哪些會員當選為代表，才能寄出開會通知，讓散居各地的當選代表動身趕來出席會議。以一個佛教最高層級的會議來說，其辦理準備的時間可謂倉促異常。

當時，青年星雲在教界的位分並不高，但認識不少中佛會高層的重量級人物，如常務理事李子寬、常務理事東初法師、常務理事太滄法師、祕書南亭法師等，¹⁷ 也與南亭法師、李子寬等共同參與



青年星雲（左四）與中佛會的重量級人物都熟識，圖中左一南亭法師、左三東初法師。（佛光山宗史館提供）

17. 太滄、東初與李子寬皆第一屆中佛會常務理事遷台者，參見釋堅如主修，顏尚文總編纂：《臺灣佛教通史·第四卷·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運作》，頁 74、75；青年星雲因編輯《人生雜誌》，有關編務與內容須常請教《人生雜誌》社長南亭法師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25·參學瑣憶 1》，頁 116；南亭法師是中佛會祕書，在當時的台北聲望無人能及，參見《星雲大師全集 217·百年佛緣 7》，頁 194。

監獄弘法等活動，卻絲毫未聽聞相關消息。他因肩負《人生雜誌》編輯工作，常往來於台北與新竹之間，出入台北首剎善導寺，¹⁸對教界消息應該是較靈通的，卻是在接到選票方知二屆中佛會即將召開，可知此會籌備之低調與默默，事前幾不見諸報導，似不甚受到外界重視，以致知者甚稀，未見耳語傳聞。

二屆中佛會大會在 8 月 30 日舉行，擊鐘開幕後，出席代表、列席者和來賓僅 70 餘人，¹⁹對比青年星雲所見第一屆中佛會全代會熙熙攘攘的盛況，不論是人員的參與、媒體的關注曝光度、改革議題之潮湧以及規模與熱鬧，兩者有天壤之別，無怪其不勝唏噓。

（二）二屆中佛會解套代表選任方式與僧信力量之懸殊

依中佛會的章程，中國大陸 36 個省、四大名山、直轄市（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）等，各有 7 個代表，²⁰代表總數應有 300 多名，但中佛會戰後在台復會，因絕大多數會員滯留大陸，許多省分如合江省、黑龍江省、海南、蒙古等，其會員少到僅有一人，²¹使得二屆代表無法以依原章程選出，這應該是中佛會改選時面臨最棘手的難題。

在星雲大師於 8 月 29 日參加大會開幕前的預備會議時，理事會的菁英們已巧妙將各省產生名額的困境解套，他在《日記》記載如下：

18. 當時台灣的報刊雜誌提到善導寺都說是台灣首剎，此處高層人士出入，消息往往靈通，青年星雲因編輯《人生雜誌》，於此掛單食宿，有較多與其他僧人、居士互動交流見聞的機會。

19. 參見釋心悟：〈中國佛教會動態〉，《人生雜誌》第 4 卷第 10 期，1952 年 10 月，頁 17。

20. 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17·百年佛緣 7》，頁 200-201。

21. 陳雲宣：〈中國佛教會來臺初期的領導群與組織（1949-1960）〉，收入釋淨良、楊維長、蘇全正主編：《臺灣佛教的歷史人物與人物》，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 / 台北：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，2019 年，頁 200。

這次大會的代表，以省為單位，除台灣照章程規定選派代表七名外，其他每省市各選派二人。代表的名簿上一共算起來只有六十四名代表，而其中大都是在家的信眾，出家的僧眾只有十三人。²²

二屆中佛會代表除台灣之外，其他各省的代表名額均被大幅減少，以解決大多省分會員嚴重不足的窘境。因召開期程如此緊迫，新選任且趕赴預備會議議場的代表僅 64 人。理應以出家眾為主體的中佛會，僧眾出席代表卻只有 13 人，遠比信眾代表 51 人要少得多，直接的影響就是進行投票時，僧眾處於相對不利的劣勢。

僧、信代表人數不成比例的原因，在於大陸各省來台的僧、信人數懸殊。早於國共內戰晚期，陳誠於 1949 年 1 月 5 日接任台灣省省主席後，為防止共方勢力滲透，並避免人口過度移入，在台實施強硬入境限制，²³ 大大緊縮入境人數。此時渡台船資高昂，能赴台的以富裕人家、政府官員及軍人為主，²⁴ 大陸僧侶若欲來台，除非經濟情況較佳，或是黨政關係好，或在台有弟子及保人，否則只

22. 引自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54·星雲日記 1》，頁 81。

23. 陳誠在台灣實施入境限制時，因影響極大，曾引起激烈反對，陳氏仍毅然實施。參見薛月順編著：《陳誠先生回憶錄：建設台灣（上）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16 年，頁 21-24。

24. 聖嚴法師指出 1949 年從上海至臺的船資高昂，須十至二十銀元，當時他一個月薪餉不到一銀元，無力負擔船費，所以投軍才能來臺，見氏著：《雪中足跡——聖嚴法師自傳》，頁 94、95、98。煮雲法師在 1950 年隨軍來台，於陸軍任軍中布教師，悟明法師是換上軍裝來台，真華法師於 1949 年被迫從軍來台，參見陳慧劍著：《當代佛門人物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有限公司，1991 年，頁 49、132、196；參見關正宗著：《重讀臺灣佛教——戰後臺灣佛教（續編）》，頁 279。淨海法師等於 1949 年參加愛國知識青年軍，方能搭軍艦前往台灣，參見釋淨海：〈我欠一分對無上法師的感恩〉，收入釋見豪、釋自衍採訪編著：《樸野僧·無上志 新竹靈隱寺無上和尙圓寂五十週年紀念》，嘉義：香光書鄉出版社，2015 年，頁 205。

能走從軍入伍或僧侶救護隊這條路，²⁵ 因此來台的大陸僧侶人數並不多。

（三）弱僧強信修法之角力與星雲大師在議場的卓越表現

二屆中佛會於 8 月 29 日先召開預備會議，其要務為大會如何選理監事與大會主席團。因出席代表的總人數僅 64 名，其中僧人 13 名，若進行理監事選舉，結果勢必無法符合原章程二十三條的規定，於是浮現修改此法的角力，青年星雲記載會議當時的情況：

若照「信眾當選理監事，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三分之一」，那麼理事是三十一人，監事是十一人，把僧眾代表全數選出來也不足理事的法定人數三分之二，有某代表站起來就主張廢止或修改這第二十三條的條文。很多的代表們都在熱烈討論著如何修改或廢止這條文的時候，我見苗頭不對……說：「……教會還是應以僧眾為主，而且從佛教的經典和戒律上來看，這條規章也是不能修改……本席相信，到我們佛教召開第三屆佛教全代大會的時候，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佛教又一定會回到南京去了，到那時僧眾亦復是多。現在我們這第二屆的大會，不過是一個權宜的大會。²⁶

25. 參見關正宗著：《重讀臺灣佛教——戰後臺灣佛教（正編）》，台北縣：大千出版社，2004 年，頁 44-45。被迫從軍來台者如白雲禪師，在大陸出家後，被抓入青年軍，從廣州送至高雄，見侯坤宏、高明芳、賴淑卿訪問，林蘭芳、鄭麗榕記錄：〈高雄千佛山白雲禪師訪談錄〉，收入國史館出版社編輯室：《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（一）》，台北縣：國史館，2007 年，頁 28-31。自願從軍者如聖嚴法師、道安法師。道安法師從香港申請來台，前後花費了兩年時間，參見關正宗著：《台灣高僧》，台北：菩提長青出版社，1996 年，頁 156。

26. 同註 22，頁 81-83。

當時會場信眾湧現修改或廢止二十三條規章聲浪，形成熱烈的修法氛圍，希望解除信眾理監事不得超過全體理監事三分之一的限制，議場整體形勢朝向僧眾代表所不樂見的修法方向發展，因信眾代表擁有壓倒性的人數優勢，出席的僧代表僅占代表總數約二成弱，勢難阻擋相關修法。

就在僧眾難以應對，修法勢在必行之際，青年星雲應變極快，短期內理出思緒，隨即挺身在大會上發言，其言辭相當條理精闢：從中國佛教會的宗旨出發，教會應以僧眾為主立論，遵守佛教經典與戒律規範為基，又指明第二屆乃短暫性的權宜之會，最後以四年後，即第三屆中佛會就會回南京復會為結論，通篇發言首尾呼應，從理論到實務上面面俱到，顯見修法既無空間，也完全沒有必要。最後的結論更善用黨國戒嚴初期的時空背景，²⁷ 使得論述立於不敗之地，讓即便最熱切修法者也會高度警惕，否則豈非認為政府四年後無法返回大陸，那就擔待不起了。

青年星雲一番鏗鏘有力的發言，在會議的關鍵時刻，成功逆轉議場的情勢，「信眾代表紛紛發言，都贊成不必修改，更不必廢止這章程上的第二十三條條文」²⁸，對確保僧侶主導中佛會體制，發揮了力挽狂瀾的作用。

（四）中佛會常務理事選舉之變與核心權力之轉移

因第二屆中佛會的僧眾代表人數不多，連布置會場的工作人員都看得出，幾乎所有僧人代表都能當選理事，青年星雲在日記中記

27. 當局於1950年6月通過《戡亂時期檢肅罪謀條例》，情治單位對有嫌疑者即行逮捕、審訊與刑求，受迫害者難計其數，戒嚴時期五〇年代，社會彌漫白色恐怖政治肅殺的氛圍，參見戚嘉林著：《臺灣史》（增訂版），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2014年，頁421-425。

28. 引自《星雲大師全集254·星雲日記1》，頁83-84。

載：「廣慈、心悟法師……笑了笑，說：『這次大會的代表中出家人太少，照情勢看來，大概每個出家人都有可能當選理事。』」²⁹ 理事選舉果然如廣慈與心悟法師所言，兩人與青年星雲皆當選理事。當選名單如下：章嘉、白聖、星雲、南亭、慈航、心悟、廣慈、悟明、演培、無上、道源、慧峰、心源、律航、果哲、煮雲、羅桑益西、張大謀、張晶英、趙恒惕、劉中一、吳仲行、朱鏡宙、黃一鳴、黃正之、馬仲侯、李子寬、簡東昌、王平、陳慧復、謝劍等 31 人，³⁰ 其中，僧侶理事 17 名，信眾理事 14 人，僧眾在理事席次上有過半優勢，取得初步勝利。

隔天上午接著召開理監事會議，在最重要的常務理事選舉時，出現「推選」、「票選」兩派意見爭執，「推選派」認為「票選」的方式有違《中國佛教會章程》第十八條「理事互推常務理事九人內推比丘一人為理事長」之規定，³¹ 但多數理事認為「票選」比「推選」更民主。最終常務理事採「票選」方式進行選舉，在 25 個出席的理事中，有兩個人棄權，開票結果，除章嘉大師和白聖法師外，青年星雲以 21 票當選常務理事。³²

在台復會的中佛會高層僧眾，因與手握大權的李子寬不睦，³³ 故而運作常務理事選舉採「票選」方式，在不憚曝露個人投票意向

29. 同註 28，頁 80。

30. 釋心悟：〈中國佛教會動態〉，《人生雜誌》第 4 卷第 10 期，1952 年 10 月，頁 1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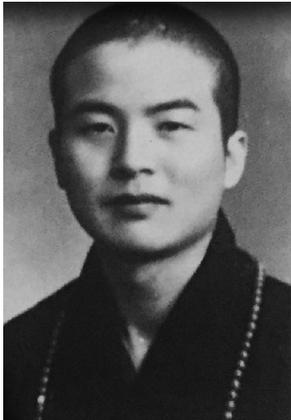
31. 該條文見《中國佛教會章程》1947 第一屆原始版，參見釋堅如主修，顏尚文總編纂：《臺灣佛教通史·第四卷·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運作》，頁 448。

32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〈我為什麼要辭「中佛會」常務理事？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0·星雲智慧 2》，頁 100-101。

33. 當時李子寬與白聖法師是敵對的，並對慈航、東初、道源、南亭等法師敬而遠之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25·參學瑣憶 1》，頁 300。

下，順利將黨政關良好但僧緣不睦的李子寬排除於常務理事之外。二屆中佛會常務理事新權力班子的組成名單為章嘉、白聖、星雲、悟明、吳仲行、孫心源、趙恆惕、孫清揚、劉中一等9人，另以票選方式選出章嘉為理事長；³⁴ 然依《星雲日記》所載，及心悟法師於《人生雜誌》所撰〈中國佛教會動態〉，9人常務理事有羅桑益西而無劉中一。³⁵

在保守的佛教界，26歲的青年星雲超越許多德高望重的長老耆碩，高票當選為中佛會核心的常務理事，得與章嘉等高僧並列，確實相當不易，應與捍衛二十三條時的精采表現有關，故而深獲肯定。然青年星雲隨即請辭這個有著榮耀光環的常務理事職務，³⁶ 一再堅辭後終於獲准，其辭呈云：



青年星雲在第二屆中佛會捍衛條規，深獲肯定，高票當選常務理事。

竊星雲年少無學，諸多欠缺，本屆佛會改選，謬承諸大德長者過愛，選任本屆常務理事一職，不勝惶恐萬分！蓋本會係全國佛教最高領導機構，非德學兼優者，不足當此重任。誠恐有誤會務進展，特此懇辭本職，請選有德有學高僧任之。即我佛教幸甚！³⁷

34. 參見南亭和尚編纂委員會編纂：《南亭和尚全集》第12冊，頁187-188。

35. 參見釋心悟：〈中國佛教會動態〉，《人生雜誌》第4卷第10期，1952年10月，頁17。

36. 星雲大師要辭常務理事時，不贊成者為之惋惜，相勸他該職務得之不易，參見《星雲大師全集254·星雲日記1》，頁91。

37. 引自《星雲大師全集254·星雲日記1》，頁87。

高票選出的常務理事當即辭職有些突兀，青年星雲提出謙抑的辭呈說明辭職的原因，對外界有所交待，以免無謂揣測。多年後，星雲大師曾數次提及當年辭職也隱含一些實務的層面考量：

一九五二年，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，並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，我那年才二十六歲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竟當選為常務理事，因自認年紀太輕，資歷淺薄，又食宿無著，故立即辭職。³⁸那時我才二十六歲，自覺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錫之地，居無定所，哪裡能承擔常務理事的責任？實在愧對佛教。³⁹

在論資排輩的保守教界中，一個沒有自己道場與徒眾、沒有師友羽翼，寄人籬下且朝不保夕的青年僧侶，在缺乏奧援與資源的情況下，突然越過眾多耆碩登頂，進入中佛會核心，內心難免不安。青年星雲在日記中曾說到自己在正義公理前容易衝動，雖然明知會得罪人，仍會毫不猶豫的單槍匹馬站出去。⁴⁰是以，他辭去常務理事的另一原因，可能也與阻擋二十三條修正案有關，畢竟堵死修法，不免引起信眾代表不快，若自行放棄常務理事，除可平息不滿者的反彈，也避免爭權自肥之譏，⁴¹且由德高望重的南亭法師遞補為常務理事，⁴²亦免於遭到側目嫉視，是相當睿智的決定，讓此事圓滿落幕。

38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89·往事百語 2》，頁 30。

39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14·百年佛緣 4》，頁 30。

40. 同註 37，頁 81。

41. 青年星雲提及，聽說有些信眾代表很擔憂不會當選，所以主張修廢二十三條，他在發言反對修法後，即浮現當選就要辭職的想法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〈我為什麼要辭「中佛會」常務理事？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0·星雲智慧 2》，頁 96、98。

42. 同註 37，頁 91。

四、戰後台灣佛教衰敗與中佛會無生氣的原因探討

青年星雲深受太虛大師復興佛教改革理念影響，在參加二屆中佛會全代會時，仍不忘提案培養人才，但大會既不宣讀他的提案說明，也不加討論，將之匆匆過場了事，維持一貫「從不知造就僧才」⁴³的局面。無怪乎他在參加二屆中佛會後，在《日記》中大發感慨：

一點生氣都沒有的中佛會……今天，佛教衰敗得是不能再衰敗了。⁴⁴

青年星雲感慨彼時中佛會之無生氣，與佛教呈現衰敗已極的局面，除了佛教一些不合時宜制度積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外，⁴⁵筆者以為，戰後台灣的內外局勢，對中佛會與台灣佛教均相當不利，試析如下：

第一，中佛會過於保守，內外交迫。中佛會成立後，因權力握於少數人手上，不容許討論與反對意見，⁴⁶盡顯其封閉與保守性，期待改革者不免失望；而中佛會在失去大陸轄區後，人力與文物資產喪失殆盡，組織受到重擊，幸得一批菁英僧侶支撐，⁴⁷雖勉強在台復會，但在多數會員星散，組織瀕於瓦解，面臨法理危機之際，決

43. 青年星雲在 1951 年 10 月對當時佛教會的感觸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〈復興佛教與批評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0·星雲智慧 2》，頁 29。

44. 引自《星雲大師全集 254·星雲日記 1》，頁 79、87。

45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與佛教青年〉、〈復興佛教與批評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0·星雲智慧 2》，頁 19、29。

46. 一屆中佛會曾封殺青年星雲等欲組織的「佛教青年會」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〈我為什麼要辭「中佛會」常務理事？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0·星雲智慧 2》，頁 2-3。

47. 參見印順法師：〈臺灣佛教叢書總序一〉，收入童勉之著：《教界領袖淨心長老》，台中：慈光寺，2008 年，頁 1。

策層仍深陷僧信矛盾，⁴⁸ 未能擺脫內部分化與會務拓展困難的泥淖。

第二，戰後台灣佛教本身困弊。太平洋戰爭後期，美軍對台灣大規模空襲轟炸，重創城鎮房舍建物、工業設備、水利、交通與衛生設施，對台灣造成巨大的破壞，以致農工生產與物資供應受到極大影響，戰爭結束後，重建有待外來資金與技術的協助。⁴⁹ 戰後民生凋弊，本地寺院整修尚未完竣，本身生存困難，較無推動教會組織與弘法的意願，且本土四大法脈高僧圓寂後，缺乏祖輩般可為領導全體之繼承人，使得台灣佛教界至 1950 年，處於停滯不前、一籌莫展的狀態。⁵⁰ 除了台灣佛教內部的紛爭傾軋不斷，⁵¹ 部分社會人士與知識分子也對佛教偏見甚深，認為佛教消極迷信，⁵² 而寺廟

48. 如李子寬與教界僧眾兩派僵持，引起漫長的僧信爭鬥，參見陳慧劍著：《當代佛門人物》，頁 220-221。

49. 張建偉：〈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》第 4 卷第 1 期，1997 年 6 月，頁 149-196。

50. 參見闕正宗著：《重讀臺灣佛教——戰後臺灣佛教（正編）》，頁 41-44；以 1948 年的十善寺為例，白聖法師接手時透風漏雨，尚待整修，參見童勉之、楊逢彬合著：《白聖長老傳》，台中：太平慈光寺，2013 年，頁 177。大仙寺 1952 年第一次傳戒時，寺方因財力不足，戒期不敢安排太久，參見侯坤宏、高明芳、賴淑卿訪問，楊璟惠記錄：〈屏東市東山寺天機法師訪談錄〉，收入國史館出版社編輯室：《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（一）》，頁 226。又五〇年代台灣佛教界的活動少，一般人不常去寺院，參見侯坤宏、高明芳、賴淑卿訪問，楊璟惠記錄：〈三峽金光明寺慈容法師訪談錄〉，收入國史館出版社編輯室：《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（一）》，頁 300。

51. 如善導寺的惡鬥，為對付印順，有心人花費偌大心力布局加以搆陷，甚至鼓動慈航法師著文攻擊，形成「為共匪鋪路」事件，參見釋印順著：《平凡的一生》，頁 53-75。

52. 當時大陸來台的居士普遍認為台灣僧尼知識水平不高，參見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：《道安法師遺集（七）》，頁 1174；徐孫銘、文平志、王傳宗著：《道安法師法脈傳記》上冊，台中：太平慈光寺，2008 年，頁 162。當時的台灣佛教被目為神道迷信之流，社會地位相當低落，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90·往事百語 3》，頁 273。

本身破落，又遭外來者進駐侵佔，⁵³ 請求發還寺產或保護也沒有著落，⁵⁴ 種種因素致使當時台灣佛教陷於困頓之境。

第三，不受政府高層支持，⁵⁵ 大陸僧侶與護法居士遭受打壓。白色恐怖時期，許多人遭到拘捕或失蹤，⁵⁶ 1950年6月發生有名的「教難」事件，政府大舉逮捕大陸來的僧人，無辜受殃者獲釋後仍受嚴密監控，過著風聲鶴唳的日子；⁵⁷ 甚者如淨海法師於1949年春投軍至台後恢復僧侶身分，因情治人員好找僧侶麻煩，使他在短短的六、七個月內，被抓捕入獄五次。⁵⁸

國民黨高層在大陸時期對佛教已有歧視之意，⁵⁹ 轉進至台灣後並未改觀，蔣宋美齡是虔誠的基督教衛理公會教友，⁶⁰ 努力推動基

-
53. 如十普寺經濟依賴經懺，僧居窄小，有豬臭味及蚊蠅騷擾，環境不佳，參見南亭和尚編纂委員會編纂：《南亭和尚全集》第12冊，頁154。星雲大師1952年首次至宜蘭最大的雷音寺弘法時，寺內簡陋破落，大殿被軍眷占住，衣物鞋襪四散，以致駐寺前半年都只能在佛桌下過夜，檢監獄丟棄的椅子回寺使用，參見符安琪著：《傳燈——星雲大師傳》，北京：現代出版社，2011年，頁61。
54. 中佛會於1952年提出返還遭占寺產等相關問題，請求政府解決，參見釋妙然主編：《民國佛教大事年紀》，台北：海潮音雜誌社，1995年，頁284。
55. 蔣宋美齡為教性堅強的基督徒，公務人員若不改信基督教，不但難以升職，連出國機會也難得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223·貧僧有話要說1》，頁279-280。蔣宋對佛教種種的壓迫，參見《星雲大師全集122·隨堂開示錄8》，頁99。
56. 黃清龍著：《蔣經國日記揭密：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》，台北：時報出版社，2020年，頁259。
57. 如星雲大師所遭遇的際遇，參見《星雲大師全集217·百年佛緣7》，頁57、176；另參看闕正宗著：《台灣高僧》，頁68-72。
58. 參見釋淨海：〈我欠一分對無上法師的感恩〉，收入釋見豪、釋自衍採訪編著：《樸野僧·無上志 新竹靈隱寺無上和尙圓寂五十週年紀念》，頁205、213-214。
59. 1946年時，太虛大師對民國政府歧視佛教已深感悵然，參見釋印順編：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頁531。
60. 【美】陶涵著，林添貴譯：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》上冊，台北：時報出版社，2011年，頁93。

督教信仰，提起佛教成了忌諱，公務員若信仰佛教，將影響仕途甚巨，⁶¹ 執法的警察機關更常直接取締弘法場地。⁶² 從黨政高層至警特基層的不友善態度，對佛教界的發展自是相當不利。

第四，台灣經濟困頓，寺院經濟挹注無著：國民政府自大陸兵敗，已民窮財困，⁶³ 但在兩岸軍事高強度對峙下，不得不維持一支龐大部隊，耗掉大部分預算。因軍事體系規模過於龐大，有限的資源遭稀釋，從聖嚴法師的從軍遭遇可知，他於 1949 年 5 月隨軍至台灣，其部隊沒有軍服，沒有鞋穿，夏天只穿一條短褲，軍隊自編草鞋，訓練課程被戲稱為「三光」——光頭、光腳、光身（上身）。⁶⁴

台灣在 1952 年時，國民所得僅 90 美元，比當時世界上低開發國家的國民平均所得 150 美元還低，⁶⁵ 對外貿易呈現巨額逆超，⁶⁶

61. 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90·佛光山開山故事》，頁 273。

62. 參見星雲大師：《星雲大師全集 225·參學瑣憶 1》，頁 73。

63. 戰後台灣農工業生產停滯，大陸局勢惡化後，人口激增且物質匱乏，物價飛漲，政府財政極端困難，經濟危機四伏，參見沈雲龍編著：《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》，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88 年，頁 96-97。1949 年時，台灣受大陸惡性通膨影響，躉售物價指數飆高至 3500%，參見蕭全政著：《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》，台北：國家政策研究中心，1989 年，頁 47。五〇年代初期台灣收支短絀，通貨膨脹嚴重，呈現百廢待興之局，參見王作榮口述，工商時報經研室記錄：《王作榮看臺灣經濟》，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9 年，頁 7。

64. 參見釋聖嚴著：《雪中足跡——聖嚴法師自傳》，頁 95、99。

65. 參見戴國輝、李毓昭譯：〈台灣的產業與經濟〉，收入戴國輝著，林彩美總校，財團法人台灣文學基金會編輯：《戴國輝全集》第七冊，台北：文訊雜誌社，2011 年，頁 114。

66. 台灣 1952 年對外貨品與勞務出口為 1.19 億美元，進口為 2.08 億美元，參見李登輝、梁國樹著，林昭武譯：〈臺灣的發展策略〉，收入于宗先總主編，薛琦主編：《臺灣對外貿易發展論文集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，1994 年，頁 94。尹仲容於 1952 年談到台灣處於對外貿易巨額逆差的不利局勢，參見沈雲龍編著：《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》，頁 155。



1950年代台灣經濟困頓，普遍物資缺乏。圖為當時台北中華路街景。

政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用在軍事相關開銷，⁶⁷ 其他項目經費捉襟見肘，經濟建設不易開展，難以挹注宗教社會團體，而百姓生活不好過，亦無餘力供養寺院，⁶⁸ 使得戰後寺院的經濟狀況持續低迷。

五、結論

星雲大師幼年即在棲霞山寺出家，大叢林的苦行與嚴厲，⁶⁹ 僧侶教育養成方式，讓他深刻了解傳統教門有著不合時宜之處，⁷⁰ 是以接觸到太虛大師所提出的佛教改革後，深受吸引。這一股改革佛

67. 陳誠於1950年3月15日至1954年5月20日組閣，他曾提到1952年軍事費用的開銷占政府支出的80.425%，1953年的軍事開銷占83.942%，見薛月順編著：《陳誠先生回憶錄：建設台灣（上）》，頁345。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四年多，從他提出的數據來看，當時台灣的軍事開銷驚人，影響其他項目支出。

68. 台灣早期經濟情況不佳，信徒生活不好，沒有餘力供養寺院，參見釋見享、釋自津採訪，釋見暉、釋見甯整理：〈釋一心訪談記錄〉，收入釋見暉編著，釋自鑰校訂：《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——釋天乙》，台北縣：中天出版社，1999年，頁303。

69. 傳統中國佛教大叢林作風都很嚴厲，沒有人情味，參見陳慧劍著：《當代佛門人物》，頁206。

70. 傳統當小和尚的日子很苦，過著如同牛馬般的生活，參見《星雲大師全集254·星雲日記1》，頁20-21。

教的浪潮，最終席捲第一屆中佛會，在各省佛教代表熱烈出席的盛會中，散發出蓬勃生機，讓青年星雲印象深刻。

青年星雲在佛學院時，開始展現文藝創作長才並主編刊物，爾後擔任國小校長與主持華藏寺改革工作，顯見不畏艱難與獨當一面的能力，1949年來台遭逢白色恐怖下的教難，脫難後仍勤於筆耕不輟，於1951年至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學與教務工作，兼任《人生月刊》編輯，其文采與編務之能，已深獲教內外肯定，而監獄與街頭弘法，磨鍊出面對群眾與大場面的膽氣及演說表達能力。

1952年初，國民政府得到美國進一步加大援助後，⁷¹在台統治趨於穩固，其施政方針調整為「確保台灣，準備反攻」策略，要求社會各界配合政策以發揮總體戰效能，⁷²中佛會也在6月收到內政部指示改選的命令，⁷³於倉促間籌辦二屆全代會。彼時台灣佛教處境艱辛，尚未從戰爭創傷中恢復，大量寺院遭政府機關與部隊人員占居。由於整體經濟困頓，民間難挹注寺院，佛學研究環境不佳，⁷⁴加之佛教不受政府高層青睞與支持，在這個情況下，二屆全代會召

71. 沈志華著：《冷戰在亞洲：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2年，頁311。

72. 1950年3月陳誠就任行政院長後，提出「確保臺灣，準備反攻」的施政方針，參見薛月順編著：《陳誠先生回憶錄：建設台灣（上）》，頁106-107、114。

73. 參見釋心悟：〈中國佛教會動態〉，《人生雜誌》第4卷第10期，1952年10月，頁17。

74. 葉阿月指出台灣的佛學研究面臨兩方面的困境，缺乏老師教學，也缺乏學生學習，影響出家眾佛學素質，參見卓遵宏、侯坤宏訪問，李翎毓記錄：〈葉阿月教授訪談錄〉，收入國史館出版社編輯室：《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（一）》，頁402。青年星雲於1953年1月感慨，當時肯向上讀書的僧青年太少，佛教女眾教育也漸漸走上末路，參見星雲大師：〈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〉，《星雲大師全集 204·雲水樓拾語》，頁230。

開前後幾無媒體聲量，由幾十個代表匆匆與會的二屆中佛會，從青年星雲的角度來看，其聲勢與一屆中佛會全代會盛況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憑著過人的膽識，機敏的臨場反應，青年星雲在二屆中佛會全代會僧信角力的關鍵時刻，適時挺身而出，以縝密條理的說辭，遏制修法二十三條，捍衛僧事僧決的傳統，其出色的表現，成了大會的風雲人物，一舉高票當選常務理事，迎來僧侶生涯首度高光的時刻。但他在衡量大局後，放棄進入中佛會權力核心的機會，以一般理事的身分，繼續努力在台推動弘揚人間佛教的工作。⁷⁵

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的召開，解決了組織法理問題，僧眾順利取回會務主導權，象徵中佛會來台復會後，組織初步盤整有成，為日後發揮主導台灣佛教全局奠下立穩腳跟的基石，透過青年星雲敏銳深刻的觀察與文采，在其日記中為歷史盛會留下見證。而從青年星雲在會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卓越表現，與堅定興革佛教的意念可見，其日後領導佛教現代化，讓佛教走向世界的開山之祖，⁷⁶ 一代宗師其來有自。

75. 1953年鳳山蓮社落成時，媒體報導，煮雲法師特別邀請中佛會星雲與廣慈兩位理事擔任講師，參見不著撰人，〈菩提樹新聞版〉，《菩提樹》第9期，1953年8月，頁30。

76. 歷史學者唐德剛評星雲大師之歷史定位，參見符芝瑛著：《雲水日月——星雲大師傳（上）》，台北：天下文化，2006年，頁22。

佛光山 人間佛教 研究院
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青年星雲與戰後台灣佛教
——以《星雲日記》所述第二屆中佛會全代會為例



星雲大師是引領佛教現代化，讓佛教走向全世界的一代高僧。